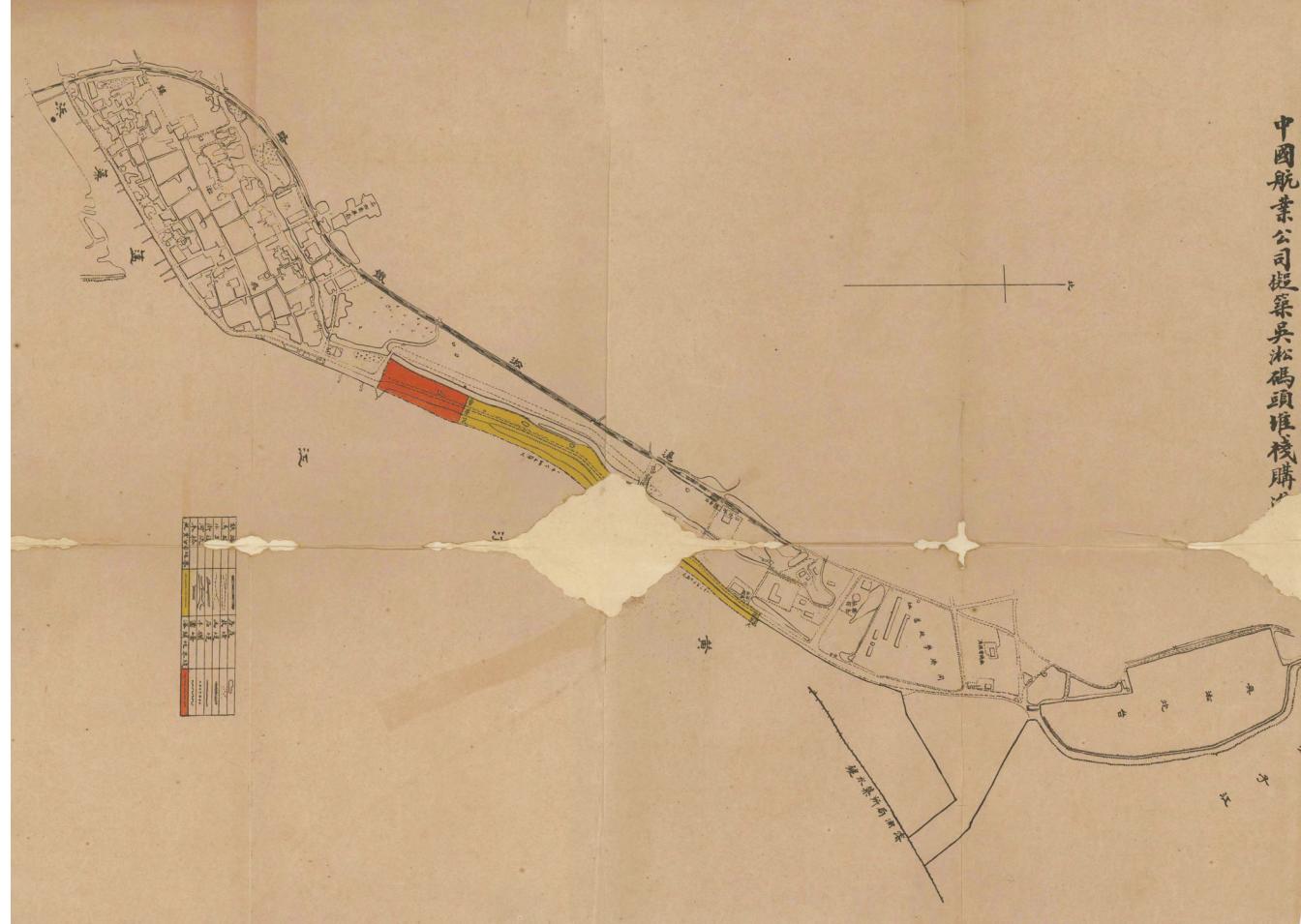


# 张謇与吴淞的教育

□朱江

20世纪初，吴淞的炮台湾逐渐聚集起一批高等学府，使得吴淞成为上海的大学城。张謇与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江苏省水产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淞大学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航业公司拟筑吴  
淞码头堆栈购进地址图》，原  
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 档案里的张謇

南通市档案馆王次

20世纪初，吴淞的炮台湾逐渐聚集起一批高等学府，使得吴淞成为上海的大学城。炮台湾原为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滩地，后因为清政府在此设立炮台而得名。炮台湾地价便宜，又有淞沪铁路延伸至此，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先后有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吴淞商船学校、江苏省水产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等入驻吴淞，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其中，张謇与前四所学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吴淞大学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

张謇是复旦公学初创时期的重要支持者。马相伯于1903年始创震旦学院，1905年因与总教习南从周在教务问题意见分歧，马相伯率学生出走，另创复旦公学。张謇认为“多一学堂，未始无益”，而且认为复旦公学“系中国自办学堂，更责无

旁贷，必合力图成，与教会乐与人为善之宗旨，当不相背”。因此一方面应耶稣会之请，担任震旦学院的董事，支持震旦的复校工作；另一方面为复旦公学的开办奔走呼号。1905年3月25日，张謇、王清穆、曾铸等多位士绅在上海一品香酒店集议，吁请马相伯主持复旦校务、讨论筹资办学事宜，同时考虑暂借吴淞陆军公所的空房先行办学。随即张謇和王清穆给两江总督周馥等发电报，得到周馥的赞同，周馥指示上海道与军方洽商，获得军方的支持。3月29日，张謇“为震旦已散学徒筹款得万元”。之后，张謇、曾铸、严复、熊希龄等人应马相伯之邀，担任复旦的校董。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举办开学典礼。11月22日，张謇邀请刚从广西来到上海的郑孝胥参观复旦公学，陪同参观的还有陈宝琛、王季樵、赵凤昌等人。复旦公学在吴淞一直办到1911年。

张謇也是中国公学的坚定支持者。1905年底，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取消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中国留学生的言论、集会、结社、居住等自由，大批留学生被迫回国。1906年1月，13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自办学校，定校名为“中国公学”。两江总督端方答应每月资助中国公学1000两，并拨吴淞炮台湾海军衙门西百余亩官地作为校址。1908年9月13日，中国公学开董事会，张謇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总董）。张謇在任内多方筹款以维持中国公学的运作，1912年，张謇率中国公学的董事，多次与北洋政府财政部交涉，要求把前清上海道蔡乃煌存放在比利时驻沪领事馆的源丰等户抵押的房产、股票，交中国公学充作经费。

张謇还是吴淞商船学校和江苏省水产学校设校的倡导者，以及两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1905年，张謇就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事宜咨呈商部，提及未来准备兴办的五项工作，其中就有在江浙渔业公司附近建立水产、商船两个学校的设想，“选渔业各小学校毕业学生，聪明而体弱者令学水产，

其强壮者令学驾驶”。

同年张謇的《呈南洋大臣议略》，设想水产学校讲授捕鱼器具的制作，以及养鱼、腌鱼、冰鱼、晒鲞的工艺，而商船学校学生在校两年练习驾船。张謇认为“水产学校兴则关系渔业，商船学校兴则关系海权。二者利民居三之一，利国居三之二”。

鉴于江浙渔业公司才在吴淞设立的初等小学校，学生毕业后方可升入拟议中的水产学校，因此张謇决定先办商船学校。张謇感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大学培养航运人才，不仅仅是与商务，也同海军有密切的联系。中国长期缺乏航运人才，轮船公司里的驾驶和机务人员都由外国人支配，不但利权受损，也无法造就本国人才。世界商战惨烈，如果要确保主权，并且辅助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据1907年7月17日《申报》刊登的张謇致上海道台瑞激的信中可知，“基址已于四月初一日开工填筑”，1907年5月12日张謇利用已经筹集的资金开始商船学校的地基建设。在张謇的努力下，江苏省水产学校于1912年设立，1913年获得吴淞炮台湾复旦公学原校址土地建设新校区。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 历史人物

# 张謇与竹行

□羌松延

从早年求取功名开始，张謇就往来于通州与海门之间。而位于通海交界地带的崇化区（大致为后来的南通县通海区）是其往返两地的必经之处，加上此后兴办有关事业等因，张謇在地处该区的今南通开发区留下了众多印迹，今择取其中的竹行一地，略记于下。

朋友圈里的竹行人

在张謇结交的竹行人之中，张衡的知名度最高。张衡，字莘田，住通州福星沙即竹行镇北约五里之新丰村，世籍海门。张衡擅画，长于人物、仙佛。

张謇所记两人交往颇多。光绪三年（1877），张謇之父张彭年与母金氏六十大寿，张衡为二老画像，张謇曾夸“金太夫人像尤肖”。次年，张衡又为张謇画“张氏吴氏四代支像”，该像后供奉于常乐张氏家庙。1880年，张謇又记“张莘田为父绘小像”。1890年，在孙云锦七十寿辰将临之际，张謇请其重画古佛，并作《古佛像赞》。1895年，已大魁天下的张謇请其“重摹朱衣神像”，并记“别属海门张衡重摹永之”。直到张衡去世后的宣统三年（1911），张謇在《题资政府君暨金太夫人画像》中又记其父母“六十岁时海门张莘田君衡为画之小像”。

张衡去世后，张謇曾为其题乡谥“端懿”匾，并有跋文称赞。该匾如今虽有残缺，然仍存于竹行。

要介绍的第二位是黄广介，字励生，通州师范首届毕业生。张謇从长远计，选择优秀学生留校任教并加以培养，付以重任，黄是其中之一。他安排“黄励生即从（屠）敬山学，作为国文助手。”他对黄励生、顾公毅寄予厚望，曾致函“愿望二子之耐心苦学，启导同学”，并嘱“因材施教，毋拂毋悖，毋倦倦志，千千万万！”言辞恳切。设立国文专修科后，张謇“延武进、屠寄（敬山）为教务长，四月开学。謇为名誉教务、庶务长，（孙）宝书为庶务长，黄广介为管理员”，足见对黄的器重。

待辛亥通州和平光复，黄励生转换了跑道，在张氏兄弟组织的通州中央队伍帮带，后又参与大有晋等盐垦事业。

1916年，张氏兄弟募集资金123万银元，在盐城创办大纲盐垦公司，委黄为经理。在面对当地民众处理垦事时，书生气的他“主忍让委蛇以利适人意……不肯以文法武力迫人”，以致“兴垦未竟全功，资料告罄”。结果，颇感厄苦的黄励生“辞不任事”，后抑郁成疾，于1923年4月病歿金陵。后灵柩运通，权置东寺，张謇亲往吊唁。

5月，张謇偕地方要人连日在《通海新报》发布黄励生《追悼会公启》，对“可用之才，有志之士，中道殂逝”的黄励生深感不舍与同情，并撰《哀黄生辞》，序曰黄“卒业师范高材生，能读古书，为博奥欲肆之文”。

追悼会于6月2日在西寺举行。张謇致词时虽痛其“独于书生之见，而不能计及深远”，以致大纲公司事失败，但仍褒扬他“能洁身自好，不屑以私利自污”，并称其为“光荣之失败”。

另据张謇日记记载，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五日，他“往少田处吊丧”，“晚晤薰南、烟锄、霞裳、少谷、莘田辈。吉甫招饮，与诸人往，酒兵鏖战，自酉至亥方憩，予之外多醺醺然已”。少田、吉甫都是竹行人，这一次的“酒兵鏖战”就在发生竹行。

又有管劲丞记述，张衡之子张槎仙，名祖骞，后曾出任南通残废院、海门老院院长。

## 代课教师张謇

关于张謇曾任教竹行一事，笔者最初所见源自《旧时经济摭拾》一书：青年张謇在南京孙云锦馆初当书记，淮军大将吴长庆与孙世交，常去访问，因赏识张謇才干，“拟聘为书记。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孙公偏爱力保。为了慎重出处，（謇）保荐秦少牧自代，而径海门竹行黄家教课一年。”

经查，张謇代课之事有其日记为证：光绪二年（1876）三月，他因“烟锄（按：即秦少牧）嘱为代庖馆事”，于二十三日申刻到达竹行黄家。当天还记有“晚，莘田、景苏来谈。”张謇居此期间，张衡频繁来访，两人还一起“散步至野寺中”，张謇曾为其题《竹林七贤图》。

张謇的竹行塾师生活应该是在愉快中度过的。除了有张衡等当地好友交流，他还兴之所至留下三篇诗作：一是到黄家两天后所作《春晚黄氏塾》，二是为黄老先生赋诗《黄封翁松鹤图》，三是在其离开竹行之时，以《示别黄氏诸子》勉励读书立志。但由诗句“西斋一月师”可知，张謇在黄家私塾的任教时间并非一年，而是一个月。据准确统计则是前后共26天。

1926年4月8日，完成老洪港勘界的张謇在日记中写下“通、海官绅会勘县界。至老洪港，泛经竹行镇，今昔五十年矣。”虽已时隔整整半个世纪，但重返故地，还是勾起了回忆，也可见他对那段竹行时光的印象是很深的。

另，上节所提黄励生，张謇在其《哀黄生辞》序中曾有“黄生广介，我故人之子”语。至于此处所讲故人，是否与他所代课的黄家有关，尚待进一步考证。

## 通海勘界老洪港

“通海两县，向以老洪港分界”。老洪港河穿竹行镇区而过，当年由镇区向西南不远就是位于江边的港口。1926年前后，“江心涨沙突起，其分线方向尚未划定”，时因“沿岸涨沙面甚广”，而港口附近“有人报领新沙，侵及通邑地址者，非明定界限，难免不受损失。”于是，南通县知事卢鸿钧“特商承张啬公昆仲邀集两县官绅会勘”。4月8日上午6时，退省二老与南通县知事及公团代表等由城南别业出发，与海门县周知事等人齐集张芝山镇公济典，共二十余人。“休憩后展览各种舆图”，九时许乘小车前往位于江滨的赛戴圩小明沟地方勘察，“旋沿江堤往老洪港”。据旧报载，当天“日光熏蒸，甚觉炎热，幸赖江风阵阵，故尚无汗流浃背之概也。抵老洪港时正值江潮盛涨，波涛澎湃，沙帆隐现，洵绝妙风景。张謇公等命用罗盘针测对，勘定以艮坤位方向定线。会勘既毕，仍乘小车往张芝山镇，换乘汽车至小海镇，时已逾午。”另据记载，勘界后，“遵照张謇公意见，于分界处树立浮标……以重管辖，而杜纠纷”。

虽年事已高且天气炎热，但张謇于勘界返通后即作《同两县知事定通海江界》一篇，为竹行地方留下又一份美好的历史文化记忆。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传家宝

# 魏聘年的一张便札

□徐继康

如今只要说起魏聘年，大家都会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傲骨廉吏”，使得这位嘉庆年间署理掘港主簿的形象一下子冷峻逼人。其实，“傲骨”只是他形象的其中一面而已，他留给后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位文人。

他是顺天通州潞河人，也就是今天北京市通州区人。他的生卒年失考，只知道他在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议叙署任掘港场主簿，而这一职务在道光《如皋县志》中并未记述，反而记载在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八的《秩官志上·文职表五》上，任职只一年。有趣的是，两年后，也就是道光元年（1821），他又出任如皋典史。主簿虽然职务不高，但是知县的重要助手，为正九品。这个掘港场主簿更是与众不同，自雍正九年（1732）因皋东地区辽阔，距县遥远不便管辖，经朝廷批准，在掘港场复设主簿一职以处理民事，所以这个掘港场的主簿，便是皋东地区最主要的行政长官。而典史，仅是县令的佐杂官，掌管缉捕、监狱等杂事，不入品级，属“未入流”。魏聘年的官，怎么会越级越小呢？今人推断当年掘港场主簿缺人，先由他代理，后来主簿朝

廷有了正式人选，魏聘年只能就任如皋典史了。魏聘年在典史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道光七年，之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原因是去世了。

道光《如皋县志》卷六《列传·名宦》有他一篇小传：

魏聘年，字野堂，直隶通州人。由诸生以四库眷录分发江南，为大吏所器重，遂补皋邑典史。莅任日，役以金献，公毅然曰：“尔金何自来？予司督捕，岂受尔金？四境安枕，是吾利也，否则法不容贷！”是由閩境肃然。后卒于官，贫不能归，葬城东门外。

魏聘年死于典史岗位上，因为穷，不能运回老家，就埋葬在如皋城的东门外。一个“未入流”的典史能够进入《列传·名宦》，足见如皋人对魏聘年的认可，这段文字也是后来魏聘年被称为“傲骨廉吏”的由来。

其实，在时人眼中，魏聘年的身份更多是一位书画家，清人刘瑗在《国朝画征补录》下卷中记载：“魏聘年，号野堂，潞河人。官皋邑典史。官极卑，骨极傲，议论极宏博，性极恬澹。工诗善画。”曾任奉天承德县典史的张虎士也有一首《题魏野堂画蟹》诗：“不住江乡那得知？江乡风物是如

斯。红尘满面君休笑，记得霜清月白时。”可见魏聘年善画。

魏聘年还得到了“一代文宗”阮元的认可，在《定香亭笔谈》中有《书魏野堂诗后》诗二首，其一云：“才高遇蹇总休谈，味遍琳琅似酒酣。诗竟如斯官未称，公犹若此我何堪？”空除野马澄银海，拟并牟尼供雪龛。前度渔洋亦李司，动人惆怅最江南。”

阮元把魏聘年比喻为清初的大名士王渔洋。一个连品秩都没有的典史，被本朝的“三朝阁老、九省疆臣”推崇到这个程度，魏聘年足可瞑目矣。

今天，魏聘年反复被人提起，是因为一部书。他曾请当地人洪允恭、吴麝收集、整理、编校自明万历至清嘉庆间掘港“土著、侨寄、现居本境”者二百多人的一千六百余首诗作，命名为《螭山诗钞》，一共十二卷。

令人奇怪的是，《螭山诗钞》刊刻于嘉庆十一年（1806）冬，这是他代署掘港场主簿的十三年之前，说明魏聘年早早就活动于掘港了。收拾明清二百余年来皋东文人的烟霞啸傲、气血风骨于一卷，聚沙成塔，一个外地人为皋东留下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化

遗产，魏聘年功莫大焉！同治《如皋县续志》卷十六将这部诗集著录，不少诗人也以其诗能入此编为荣，如管囊的小传中就有“魏野堂少府选其诗入《螭山诗钞》”之句。对一个一辈子活得窝囊憋屈的小文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为风光的呢？

魏聘年的传世墨迹极罕，敝斋之中，有一张便札：

奉患毫三管，薪检入，第不识能否合用？昨晚新房房主，果以假寐得之，佩服佩服，此请早安！弟聘年顿首。

这疑似写给一位女子的。魏聘年给她送来三支毛笔，就在他小睡的片刻时间里，这位女子便完成了一件女工艺术品，这让魏聘年很是钦佩。这张便札没有上款，不知这位女子为何人，但从魏聘年的语气来看，应该是他极为熟悉的人，而且艺术素养很高。

魏聘年“由诸生以四库眷录”出身，字肯定是指得极好的。细看这张便札，书法风姿俊爽，典雅遒劲，加之写在一张桃叶笺上，显得格外的秀逸。

岁月留下一张小小的纸条，让我们在“傲骨”之外，又看到了魏聘年似水柔情的一面。

## 史海回眸

# 名噪一时的“火炬牌”手表

□程太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通手表厂生产的“火炬牌”手表，曾名噪一时，现在有印象的人可能不多了。

四五十年前，“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每个家庭都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那时候，小青年处对象差不多要成家的时候，男方最烦恼的就是怎样配齐“三转一响”。没有“三转一响”就不要想如迎娶新娘。市场有需求，地方工业就要为市场需要服务，南通先后办起了手表厂、自行车厂（1976年生产长江牌ZA76型自行车

3000辆。1984年7月份后与上海自行车厂联合生产永久牌ZA51型载重自行车、缝纫机配件厂、无线电厂（曾生产丰收牌301-A型收音机、丰收牌JT301-B型晶体管收音机、丰收牌JT301-C型三管晶体管收音机）等。

南通手表厂由南通韬奋印刷厂于1975年下半年筹建，地址在南大街97号，筹建初期，有职工110余人，工厂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150万元。当时，江苏境内生产手表及手表零部件的除南通手表厂外，还

厂家学习，先后派人赴南京手表厂、西安红旗手表厂学习，组织科研攻关小组，攻克生产技术难题。经过全厂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生产出了“火炬牌”17钻全钢防震单历表。此表不仅防震，还防磁、防水，市场价格仅65元（当时9钻的“钟山牌”手表售价也达35元）。“火炬牌”手表是真正的价廉物美，一时间供不应求，需要凭“计划票”才能买到。南通地区戴“火炬牌”手表的人愈来愈多，南通手表厂的知名度、美誉度也越来越高。南通手表厂多次受到轻工系统的表彰。